

# 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生计策略、 生计资本与家庭收入影响研究<sup>\*</sup>

——以云南少数民族深度贫困地区为例

马明<sup>1</sup> 陈绍军<sup>1</sup> 陶思吉<sup>2</sup> 曹志杰<sup>1</sup>

(1. 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南京 210098; 2. 云南师范大学哲学与政法学院, 昆明 650500)

**提 要:** 国家“十四五”时期,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增强内生发展能力是重点, 由此理解易地扶贫搬迁导致的移民生计策略改变、家庭收入增加的影响因素是关键。本文利用云南省怒江州 515 个入户调查数据, 分析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的生计策略与家庭收入差异; 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 建立移民收入回归模型, 分析核心生计资本等因素对不同生计策略移民家庭收入贡献的差异。研究表明, 易地扶贫搬迁改变了移民家庭生计策略, 大幅减少了以农业生产为主的低收入家庭, 而且非农程度化越高, 家庭收入增加越明显, 易地扶贫搬迁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反贫困效应明显。收入回归结果表明, 不同生计策略的移民家庭收入影响因素差异明显。安置社区风俗习惯差异和少数民族文化保留与开发、社区管理、家庭劳动力人口数显著影响移民家庭收入, 五大生计资本核心对移民家庭的收入影响和贡献差异不同。其中, 人情往来、家有资产、非农劳动力和家庭存款对移民家庭收入贡献突出。本文为考察少数民族地区相关反贫困政策效应和制定精准生计扶持政策具有参考意义。

**关键词:** 深度贫困地区; 易地扶贫搬迁; 生计策略; 生计资本与家庭收入

**中图分类号:** F304

**文献标识码:** A

2020 年底, 国家“十三五”规划的易地扶贫搬迁任务全面完成, 960 万易地搬迁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和国家的“十四五”规划均指出“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做好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帮扶工作, 增强其内生发展能力。”2020 年 12 月, 云南省 88 个贫困县全部脱贫摘帽、11 个直过民族和人口较少民族实现整族脱贫。云南省西北地区生态环境脆弱、自然灾害频发, 生产生活条件落后。为了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和改善生计、教育、医疗条件, 云南省实施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挪穷窝”、“斩穷根”扶贫搬迁, 99.6 万人从深山里搬到城郊和乡镇。

易地扶贫搬迁是解决深度贫困地区脱贫的主要手段, 但农户迁移的动力取决于“经济理性的选择”<sup>[1]</sup>。易地扶贫搬迁使移民的生产生活变迁较大, 对于从事农业生产生活的少数民族移民群体, 搬迁后的发展转型是生存需要。如何快速的适应城镇化的生产、生活, 深刻影响着移民生计和搬迁效果<sup>[2]</sup>。搬迁后, 由于生活生产支出、生计重构等方面的原因, 移民极易返贫, 需围绕生计资本内涵培养移民可持续生计的累积能力<sup>[3]</sup>, 生计是建立在能力、资产和活动基础之上的谋生方式<sup>[4]</sup>。DFID 在《Sustainable Livelihoods Guidance Sheets》中阐述的 SL 框架认为生计资产五边形是生计的核心内容, 不同的资产组合可以达到不同的生计结果。可以通过不同类型资产的组合来应对风险和冲击, 并在各种生计策略的灵活转换中寻求维护其生计安全的可能<sup>[5]</sup>。易地扶贫搬迁使农户的生计策略在整体上由农业转向非农业, 并且部分策略的转变存在滞后性。生计策略取决于个人和周围的资源所驱动<sup>[4]</sup>。

研究表明, 搬迁后移民生计资本总体水平较低<sup>[6]</sup>, 农户所拥有的生计资本越多, 增收的可能性就会越

<sup>\*</sup> 收稿日期: 2020-12-14; 修回日期: 2021-4-7。

基金项目: 水库移民研究中心湖北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开放基金项目(2020KF03);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9ZDA172); 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研究生项目(2019Y0055)资助。

作者简介: 马明(1992-), 男, 汉族, 陕西宝鸡人, 博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移民社会学、反贫困、社会治理研究。

E-mail: ming@hhu.edu.cn

大<sup>[7]</sup>。由于其他类型生计资本的匮乏,贫困农户对自然资本的依赖严重,人力资本的积累是提高贫困农户家庭收入最有效的途径<sup>[8]</sup>。而且,农户会对生计资产进行组合来选择某种生计策略<sup>[9,10,11]</sup>。农户拥有的生计资产越多,选择生计策略的余地就越大,更能够灵活地自我调整,从而提高生计水平<sup>[12,13]</sup>。搬迁后的自然资本、物质资本以及社会资本是造成深度贫困地区农户家庭总收入水平差异的重要影响因素,确保这三类可持续生计资本增收功能的有效发挥是提高贫困农户收入水平的关键<sup>[14]</sup>。搬迁使移民物质资本提高较大<sup>[15]</sup>,物质资本的自有资产显著影响着移民的非农经营活动,自有资产越高的移民,其非农经营收入也显著较高<sup>[16]</sup>。另外,不同收入水平下农户的各项生计资本存在显著差异,尤其以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差距最大。农户的生计结构决定着自身经济收入水平<sup>[17]</sup>,五大生计资本对农户收入水平的影响不尽相同<sup>[18]</sup>,社会网络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较大<sup>[19]</sup>。以外出务工为核心的工资性收入已成为农户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sup>[20]</sup>,该生计策略要求农户有在外独立生存谋生的能力<sup>[21,22,23]</sup>,因此选择外出务工策略的家庭会更看重该家庭的人力资本的建立。非农自营生计策略要求稳健的资金供给,拥有金融资本的农户会有更多的民间借贷渠道,从而更有可能创办自营工商业<sup>[24,25,26]</sup>。另外,教育是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重要因素。

云南省少数民族地区的易地扶贫搬迁不同于其它地区。其一,生态环境脆弱、自然灾害频发,生产生活条件落后。其二,不同的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差异大且搬迁后存在多民族安置在同一社区的情况。其三,云南省易地扶贫搬迁的少数民族涵盖了傈僳族、独龙族等“直过民族”。“稳得住”和“能致富”是国家“十四五”期间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重点,“稳得住”的重点在于搬迁后的少数民族移民面临生计冲击、生计重构和生计策略转变的精准扶持,“能致富”的重点在于移民家庭稳定的收入增长。本文主要分析移民家庭生计策略转变以及不同生计策略的家庭收入差异,进一步引入生计资本,分析核心生计资本等因素对不同生计策略下移民家庭的收入贡献差异,进而提出策略建议。本文对于考察少数民族地区相关反贫困政策效应及巩固脱贫攻坚效果具有参考意义。

## 1 材料来源与生计策略

### 1.1 怒江州概况

怒江州是“三区三州”和“直过民族”地区,是中国民族族别成份最多和人口较少民族最多的自治州,是集“边疆、民族、直过、山区、贫困”为一体的国家层面深度贫困地区,具有贫困面广、贫困程度深、贫困发生率高等特点。怒江州总人口55.7万人,位于“世界屋脊”青藏高原南延部分横断山脉纵谷地带,多为高山陡坡,可耕地面积少,垦殖系数不足4%,76.6%的耕地坡度均在25度以上,可耕地中高山地占28.9%,山区半山区地占63.5%。怒江州云南省易地扶贫搬迁总人数为99.6万,怒江州易地搬迁人数为10.2万。由于怒江州多山,平坦土地少且多集中在城郊,为了满足搬迁后的移民在教育医疗等方面保障,怒江州易地扶贫搬迁主要实行县城安置和集镇安置,基本为无土安置。

搬迁后,怒江州相关部门主要采取从两方面入手恢复、改善移民生计和增加移民家庭收入。一方面,移民家庭原有土地进行统一复垦,复垦后的土地确权给搬迁户,赋予搬迁户相应的经营承包权;复绿后的林地确权给搬迁户,赋予搬迁户相应的林地经营权。因此,搬迁后,仍有部分生计转型困难和务农技能较好的移民仍然可以返回原居住地进行农业生产以维持生计。同时,怒江州相关部门开展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的资产收益扶贫。通过土地入股、土地托管、代耕代种等方式发展农业产业,以公司+集体经济组织+农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户等模式,盘活承包地经营权,开展农村合作社,经营特色农业,吸纳务农能手加入农村合作社。

另一方面,怒江州采取就业和创业促进移民工资性增收,怒江州与珠海市签订东西帮扶计划,通过技能培训和劳务输出推动移民就业。鼓励移民就近、就地就业,部分移民采取就近进城务工和在安置区的商铺、集贸市场等进行自主创业。另外,怒江州针对就业困难的移民采取公益岗位托底就业。同时,根据以上就业策略确保有培训意愿和劳动能力的建档立卡搬迁人口至少接受一次职业培训、掌握一项职业技能,有劳动能力的贫困家庭每户有一人以上就业。

### 1.2 数据来源

笔者2019年8月在云南省怒江州深度贫困地区展开调研,包括搬迁户和随迁户,调研的移民家庭基本已搬迁一年半左右。主要通过发放问卷、实地参与观察和半结构化访谈的方式调查易地扶贫搬迁移民家庭收入、人口结构、生计现状、安置社区概况等。为保证数据的代表性和典型性,避免调查样本选择差异

带来的影响,调研按照怒江州易地扶贫安置县区具体情况、入住安置点情况排序,按照排序高低抽样选择6个安置点。泸水市2个安置点共发放150份调查问卷,兰坪县2个安置点发放调查问卷250份,福贡县2个安置点发放调查问卷150份,用逐级随机抽样法选择样本,按照每户一份的原则共发放550份,收回问卷550份,回收率为100%;收回有效问卷515份,有效率为93.7%。

在515个有效调查样本中,男性占57.1%,女性占42.9%。调查对象的平均年龄为38.5岁,主要集中在30-55岁,共计296人,占比57.5%。文化程度上,移民文化程度整体较低,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有463人,占比89.9%(其中小学及以下所占比例为65%),高中及以上的学历的人数仅占10.1%。在民族构成上,少数民族移民户占比为98.3%,包含白族、独龙族、傈僳族、怒族、普米族、彝族,涵盖了傈僳族、独龙族等直过民族。其中傈僳族有304人,占59%,汉族人数占比1.7%。

### 1.3 生计策略

本文纳入生计策略,分析搬迁前和搬迁后移民家庭生计策略的差异、家庭收入的差异和不同生计策略家庭收入的影响因素。生计策略是移民根据生产生活技能和家庭资产拥有的选择,是移民根据其家庭资源禀赋转化为有效的生计成果,进而实现生计目标的手段。

生计策略的选择和分类有多种类型,根据实际情况,将移民的生计策略分为纯农业类型、农业为主务工为辅类型、务工为主农业为辅类型、纯务工类型、非农经营类型和生计多样类型。纯农业类型仅是以种植、养殖等为主;农业为主务工为辅类型是以种植、养殖等为主、就近务工和外出务工为辅;务工为主农业为辅类型是以就近务工、外出务工为主、种植和养殖等辅;纯务工类型是以就近务工和外出务工为主;非农经营类型是以移民自主经营商品为主,包括小饭店和生活便利店等。生计多样类型是包含两种以上的生计方式。

## 2 收入模型

### 2.1 理论分析

本文聚焦易地扶贫搬迁所导致的少数民族移民生计策略转变,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和Mincer收入模型分析不同生计策略的移民家庭收入影响,分析如何将生计资本转化为有效的生计成果,进而改善移民家庭收入。生计策略的转变是易地搬迁的后果之一,移民如何根据自身的资源禀赋选择有效的生计策略,如何将不同资产优化、组合来应对风险和冲击,并在不同生计策略的转变中寻求生计的可持续,进而实现生计目标是关键。

易地扶贫搬迁对移民家庭的生计重构和生计冲击较大,移民如何根据所拥有的生计资本进行组合,进而改善生计是关键。移民所拥有的生计资本越多,增收的可能性就会越高<sup>[7]</sup>。人力资本的积累是提高贫困农户家庭收入最有效的途径<sup>[8]</sup>,自然资本、物质资本、社会资本是造成深度贫困地区农户家庭总收入差异的重要影响因素<sup>[14]</sup>,物质资本的自有资产显著影响着家庭的非农经营活动,自有资产越高的移民,其非农经营收入也显著较高<sup>[16]</sup>。五大生计资本对农户收入水平的影响不尽相同<sup>[18]</sup>,而以外出务工为核心的工资性收入是家庭收入的重要部分<sup>[20]</sup>。拥有不同资源禀赋的移民家庭决定了其不同的生计策略,不同的生计资本组合影响着不同的生计策略移民家庭收入的增加。

### 2.2 收入模型构建

移民家庭收入模型是在Mincer收入模型基础上进行扩展:即沿用半对数模型形式,对移民家庭总收入取对数,并引入安置点区位因素、文化因素、社区因素、家庭因素、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自然资本核心指标等相关变量,构建模型如下:

$$\ln y = \beta_0 + \beta_1 \text{Geo} + \beta_2 \text{LocF} + \beta_3 \text{CluF} + \beta_4 \text{CumF} + \beta_5 \text{FF} + \beta_6 \text{HC} + \beta_7 \text{SC} + \beta_8 \text{PC} + \beta_9 \text{NC} + \beta_{10} \text{FC} + \varepsilon$$

其中 $\ln y$ 表示移民家庭总收入的对数形式,解释变量为总体分类; $\text{Geo}$ 表示地区虚拟变量,问卷调查涉及6个乡村,因此共包含5个虚拟变量; $\text{LocF}$ 表示安置点区位因素组, $\text{CluF}$ 表示文化因素组, $\text{CumF}$ 表示社区因素组, $\text{FF}$ 表示家庭因素组, $\text{HC}$ 表示人力资本, $\text{SC}$ 表示社会资本, $\text{PC}$ 表示物质资本, $\text{NC}$ 表示自然资本, $\text{FC}$ 表示金融资本(表1)。

选择半对数模型是由于半对数模型估计结果与其它模型差异不大且避免了线性模型中常数项影响收入的争议。为便于模型分析将纯农业类型归到农业为主类型,务工为辅类型、纯务工类型和非农经营性归到生计多样类型。

基于总样本、不同生计策略的生计资本和家庭收入回归。在移民家庭收入模型的基础上,采用最小二乘法(OLS)估计模型系数。首先,在总样本中放入生计资本(模型1),估计对移民收入的影响,再考虑将农业为主务工为辅类型样本中放入生计资本(模型2)、务工为主农业为辅类型样本中放入生计资本(模型3)、生计多样类型样本中放入生计资本(模型4),估计不同策略下移民家庭收入的影响(表3)。

### 2.3 收入模型变量

本文分析移民核心生计资本对移民家庭总收入的贡献与影响因素,并进一步分析不同生计策略下的家庭收入贡献与影响因素,探讨安置点区位、文化、社区、家庭和核心生计资本对移民家庭收入的贡献程度,主要涉及变量如下:

(1) 家庭总收入。将家庭总收入定义为农业收入、林业收入、集体资产收入、非农经营收入、务工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等。其中,集体资产收入为农业合作社的经营分红收入,转移性收入包括政府补助等收入。后续的回归,以家庭总收入的对数值作为被解释变量。

(2) 安置点区位因素包括了返回原居住地的成本和时间,由于搬迁后移民耕地仍继续种植,而且耕地流转后进一步规划为农村合作社,部分移民工作在农村合作社,故返回原居住地的成本和时间对生计资本中的自然资本有重要的影响。

(3) 文化因素包括的社区风俗习惯的差异程度、搬迁工程对少数民族文化保留和开发的程度。搬迁会导致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对生计资本的提升有着重要的影响。而少数民族的文化保留和开发也是移民“稳得住”的关键。

(4) 社区因素包括社区管理增强程度和居住地的环境满意度,社区管理的增强对移民的技能培训、其它政策宣传有着重要的影响,移民对于社区的环境态度对“稳得住”有影响。

(5) 家庭因素包括家庭人口数量和非农劳动力人口数量以及儿女教育满意度,家庭规模对农户收入有显著的负向作用<sup>[16]</sup>,非农劳动力对搬迁后的家庭生计转型有着重要的影响,儿女的受教育情况是潜在的家庭收入影响因素。

(6) 核心生计资本对移民家庭总收入的影响。根据可持续生计框架,将移民家庭的生计资本分为五类资本,采取五类资本中的核心维度来衡量各类生计资本对移民家庭收入的影响。其中,人力资本选取家庭劳动力人口数,人力资本结果受劳动力数量影响较大<sup>[17]</sup>。另外,是否参加农村合作社,利用务农技术补充收入也是关键;社会资本选取人情往来次数,家庭年收入越高、人情往来投入资金越多,人情往来对于农户非农化转变具有重要的正向作用<sup>[17]</sup>;物质资本选取家有资产,物质资本的自有资产显著影响着家庭的非农经营活动<sup>[16]</sup>;自然资本选取耕地面积;金融资本选取银行存款,金融资本会促进农户收入水平的增加<sup>[7]</sup>。由于上述五种生计资本的含义各不相同,设置具体指标的计量单位也有所差异。因此,对移民生计资本进行量化,并参考国内学者有关生计资本的研究方法<sup>[27]</sup>。通过客观定量和主观评价来分类赋值,然后采用极差标准化方法使不同性质和类别的指标值均处于0-1之间,便于模型分析。

(7) 其它解释变量。地理位置是影响农村收入不平衡的突出因素<sup>[28]</sup>,因此引入乡级哑变量,以衡量地理因素对移民家庭收入的影响。变量的设置与取值(表1)。

## 3 结果与分析

### 3.1 生计策略与家庭收入变化分析

搬迁导致移民生计策略变化较大。少数民族搬迁后外出务工的增加趋势更大,在一定的人口环境容量下,迁入一部分人口,必然会导致部分人口外流,并且人口的流出更容易发生在新迁入者里。<sup>[29]</sup>由表2可知,搬迁前,生计策略为纯农业类型占比45%、农业为主务工为辅类型占比40.4%、务工为主农业为辅类型占比9.9%、纯务工类型占比3.7%、非农经营类型占比0.8%、生计多样类型占比14.6%。移民基本从事农业生产生活以维持生计。搬迁后,生计策略为纯农业类型占比3.7%、农业为主务工为辅类型占比19.4%、务工为主农业为辅类型占比45.2%、纯务工类型占比28.5%、非农经营类型占比2.1%、生计多样类型占比1%。移民家庭基本从事非农业生产生活以维持生计。

搬迁导致移民家庭生计策略由农业转向非农较为明显,搬迁后生计策略是纯农业类型的下降41.3%、生计策略是农业为主务工为辅类型下降21%、生计策略是务工为主农业为辅类型上升35.3%、生计策略是纯务工类型上升24.8%、生计策略是非农经营类型上升1.3%、生计多样类型占比下降13.6%。

另外,搬迁前,生计策略是纯农业和农业为主类型占比为 85.4%,纯务工和务工为主类型占比为 13.6%;搬迁后,生计策略是纯农业和以农业为主类型占比 23.1%,纯务工和务工为主类型占比为 78.7%。由此可知,易地扶贫搬迁后移民生计策略明显的由以农业为主转向非农业为主。

表 1 生计资本、家庭总收入模型变量设置

Table 1 Variable setting for livelihood capital and total household income model

变量名称	定义	均值	标准差
被解释变量( Lny)			
家庭总收入	家庭总收入的对数值(元)	9.303	1.57697
安置区位因素( LocF)			
返回原居住地成本	返回原居住地的花费(元)	38.9	40.1
返回原居住地时间	返回原居住地的时间(小时)	2.5	4.1
文化因素( CluF)			
社区风俗习惯差异	社区风俗习惯差异程度(1-5)	2.9	1
少数民族文化的保留和开发程度	文化的保留和开发程度(1-5)	3.51	0.728
社区因素( CumF)			
社区管理增强程度	政府及其相关办事部门在社区中的作用增强程度(5-1)	3.8	0.9
居住地环境满意度	社区环境满意度(1-5)	3.7	1
家庭因素( FF)			
家庭人口数	人数	4.6	1.5
非农劳动力人口数	家庭总的非劳动力数量	1.1	1
儿女受教育满意度	儿女的受教育情况满意度(1-5)	3.78	0.6
人力资本( HC)			
家庭劳动力人口数	家庭总劳动力数量	2	1
参加农村合作社	参加农村合作社	0.17	0.377
社会资本( SC)			
人情往来次数	次数	7.6	15.2
物质资本( PC)			
家有资产	摩托车、小汽车、电视机、洗衣机、冰箱、液化灶、自来水,有一项计 1	3.2	1.2
自然资本( NC)			
耕地面积	亩	12.7	20
金融资本( FC)			
银行存款	是否在金融机构(银行、信用社)有存款,能赋值 1 不能赋值 0	0.25	0.433
地理因素( Geo)	以乡为单位,6 个乡镇		

表 2 生计策略类型百分比与家庭收入

Table 2 Percentages of livelihood strategy types and household incomes

生计策略类型	纯农业类型	农业为主 务工为辅类型	务工为主 农业为辅类型	纯务工 类型	非农经 营类型	生计多 样类型
搬迁前						
百分比(%)	45	40.4	9.9	3.7	0.8	0.2
频率	232	208	51	19	4	1
人均年收入(元)	7407.7	11476.4	17027.2	29810.5	28000	36000
搬迁后						
百分比(%)	3.7	19.4	45.2	28.5	2.1	1
频率	19	100	233	147	11	5
人均年收入(元)	5384.2	8700.7	13547.5	14862.1	20754.6	19540

易地扶贫搬迁是怒江州脱贫的主要手段,移民最大的问题是失去工作或与原居住地有关的经济来源<sup>[30]</sup>。根据总样本的移民家庭收入显示,搬迁前移民家庭人均年收入为 12069.43 元,搬迁后为 12569.43 元,上升幅度 4.14%,易地扶贫搬迁的增收明显。由表 2 可知,无论是搬迁前和搬迁后,生计策略为非农类型的移民家庭收入均高于为农业的移民家庭收入。而且,非农程度化越高,家庭收入增加越明显。搬迁前移民生计策略是纯农业类型占比 45%,人均年收入 7407.7 元;农业为主务工为辅类型占比 40.4%,人均年收入为 11476.4 元。而搬迁后务工为主农业为辅类型占比 45.2%,人均年收入为 13547.5 元,搬迁后纯务工类型占比 28.5%,人均年收入为 14862.1 元。生计策略的转变带动的是家庭收入的增加。

劳动力类型移民务工所看重的是收入待遇<sup>[31]</sup>,由于怒江的平坦土地较少和易地扶贫搬迁主要为县城安置和集镇安置,怒江就采取特色产业帮扶、东西帮扶等策略,形成了就近务工和外出务工等就业帮扶,以增加收入。虽然易地扶贫搬迁导致不同类型生计策略的移民家庭收入有损伤,但是搬迁改变了移民生计

策略的结构,大幅度减少了以农业生产生活为主的低收入家庭,易地扶贫搬迁以促进低收入家庭的生计策略转变,进而促进低收入家庭收入的增长。

### 3.2 生计资本与移民家庭收入分析

#### 3.2.1 总样本的移民家庭收入分析

首先,各类生计资本单独纳入模型时,解释变量的系数与模型 1 相比差异不大,引入核心解释变量,系数也未发生明显变化,表明回归估计结果较为稳健。因此,总样本的移民家庭收入影响基于模型 1 的结果进行具体分析。

(1) 区位、文化、社区和家庭因素对移民家庭收入的影响。返回居住点时间和成本变量通过 5% 和 10% 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其中,返回

居住地时间系数为负数。在其他因素保持不变的情况下,返回居住地时间增加 1 个单位,移民家庭收入下降 3.7%;社区风俗习惯差异和少数民族文化的保留和开发的程度变量通过 1% 和 10% 的显著性水平检验,社区风俗习惯差异系数为负数。搬迁后安置社区与原居住地的风俗差异增加 1 个单位,移民家庭收入减少 22%。少数民族文化的保留和开发的程度系数为正数,安置社区的少数民族文化保留开发程度增加 1 个单位,移民家庭收入增加 18.4%;社区管理增强程度变量通过 1% 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其社区管理增强程度系数为正数。在其他因素保持不变的情况下,社区管理增强程度增加 1 个单位,移民家庭收入上升 35.2%。家庭人口数、非农劳动力人口数变量通过 1% 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和儿女受教育满意度通过 5% 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家庭人口数系数为负数、非农劳动力人口数系数和儿女受教育满意度系数为正数。在其他因素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家庭人口数增长 1 个单位,移民家庭收入下降 18.2%;家庭非农劳动力人口数增长 1 个单位,移民总收入上升 25.1%;家庭儿女受教育满意度增长 1 个单位,移民总收入上升 27%。地理因素对移民家庭总收入影响甚微。

表 3 移民生计资本与家庭总收入 OLS 估计

Table 3 Estimation of immigrants' livelihood capital and total household income by OLS

变量名称	模型 1 (总样本)	模型 2 (农业为主)	模型 3 (务工为主)	模型 4 (生计多样)
区位因素				
返回居住地成本	0.008 ***	0.008 **	0.01 **	0.012 **
返回居住地时间	-0.037 **	-0.006	-0.04	-0.007
文化因素				
社区风俗习惯差异	-0.221 ***	-0.022	-0.479 ***	-0.398 ***
少数民族文化的保留和开发	0.184 *	0.097	-0.031	-0.209
社区因素				
社区管理增强程度	0.352 ***	0.336 **	0.458 ***	0.299 *
居住地环境满意度	-0.146	-0.16	-0.126	-0.244
家庭因素				
家庭人口	-0.182 ***	-0.192 **	-0.162 **	-0.284 **
非农劳动力人口	0.251 ***	0.284 **	0.132	0.309 *
儿女受教育满意度	0.27 **	0.137	0.338 *	0.705 **
自然资本				
耕地面积	0.004	0.826	-0.795	1.714
社会资本				
人情往来次数	1.631 *	-0.476	-1.941	3.670 ***
物质资本				
家有资产	0.626 *	0.675	0.786	0.551
人力资本				
家庭劳动力人口	0.72 ***	0.817 ***	0.7 ***	0.428
参加农村合作社	0.236	0.223	0.405	-0.44
金融资本				
家庭存款	0.538 ***	0.322	0.392 *	1.013 ***
地理因素				
兰坪 TD	0.286	0.722	0.589 *	-0.444
福贡 SY	0.111	0.262	0.685 *	-0.982
福贡 ZZ	-0.172	0.343	-0.617	0.490
泸水 DL	0.102	0.675 *	0.331	-1.463 **
泸水 BS	0.129	0.370	0.052	-0.307
常数项	5.671 ***	5.236 ***	6.481 ***	6.213 ***
R <sup>2</sup>	0.432	0.318	0.46	0.591
F	15.576	4.613	7.893	5.617

注: \*\*\*, \*\*, \* 分别表示  $p < 0.01$ ;  $p < 0.05$ ;  $p < 0.1$ 。

(2) 生计资本对移民家庭收入的影响。自然资本,耕地面积变量未通过 10% 显著性水平检验,其耕地面积对其收入无贡献;社会资本,人情往来次数变量通过 10% 显著性水平检验,人情往来次数系数为正数,人情往来次数每增加 1 个单位,移民家庭总收入平均增加 163.1%;物质资本,家有资产变量通过 10% 显著性水平检验,家有资产系数为正数,家有固定资产每增加 1 个单位,移民家庭总收入平均提高 62.6%;人力资本,家庭劳动力人口变量通过 1% 显著性水平检验,家有劳动力数系数为正数,家庭劳动力人口增加 1 个单位,对移民家庭收入影响程度为 72%;金融资本,家庭存款变量通过 1% 显著性水平检验,家

庭存款系数为正数,家庭存款每增加1个单位,对移民家庭收入影响程度为53.8%。

### 3.2.2 不同生计策略的移民家庭收入分析

生计策略以农业为主务工为辅类型的移民家庭总收入回归结果显示(模型2),社区管理变量通过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社区管理每增长1个单位,移民家庭收入增加33.6%;家庭人口数变量和非农劳动力人口数通过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家庭人口数每增加1个单位,移民家庭收入减少19.2%,家庭非农劳动力每增加1个单位,移民家庭收入增加28.4%;人力资本对其影响最大,家庭劳动力人口数增加1个单位,家庭收入增加81.7%。

生计策略以务工为主农业为辅类型的移民家庭总收入回归结果显示(模型3),社区风俗习惯差异变量和社区管理程度变量通过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社区风俗习惯差异每增加1个单位,移民家庭收入就减少47.9%;社区管理程度每增加1个单位,移民家庭收入增加45.8%;家庭人口数通过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家庭人口数每增加1个单位,移民家庭收入减少16.2%;儿女受教育满意度通过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儿女受教育满意度每增加1个单位,移民家庭收入增加33.8%;人力资本的核心资本家庭劳动力人口变量通过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家庭劳动力每增加1个单位,移民家庭收入增加70%;金融资本的核心资本家庭存款变量通过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家庭存款每增加1个单位,移民家庭收入增加39.2%。

生计策略为生计多样类型的移民家庭总收入回归结果显示(模型4),社区风俗习惯差异变量通过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社区风俗习惯差异每增加1个单位,移民家庭收入就减少39.8%;社区管理程度变量通过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社区管理程度每增加1个单位,移民家庭收入增加29.9%;家庭人口数通过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家庭人口数每增加1个单位,移民家庭收入减少28.4%;家庭非农劳动力人口变量通过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家庭非农劳动力每增加1个单位,移民家庭收入增加30.9%;儿女受教育满意度通过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儿女受教育满意度每增加1个单位,移民家庭收入增加70.5%;社会资本的核心资本人情往来次数变量通过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人情往来次数每增加1个单位,移民家庭收入增加367%;金融资本的核心资本家庭存款变量通过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家庭存款每增加1个单位,移民家庭收入增加101.3%。

## 4 讨论

(1) 深度贫困的民族地区易地扶贫搬迁后,自然资本、社会资本和金融资本差异明显。其它地区搬迁后自然资本不再是主要资本<sup>[7]</sup>,怒江地区搬迁后虽然自然资本的核心耕地面积对移民家庭收入无贡献,为了以防掉入数字陷阱<sup>[32]</sup>,需综合考虑生计结构中的自然资本。搬迁后仍有23.1%的移民家庭以农业生产生活为主,不同的安置方式对农户生计影响各异<sup>[33]</sup>。搬迁后,生计策略是农业生产生活为主的移民家庭,自然资本依然占据重要地位。

(2) 易地扶贫搬迁对少数民族的生产生活影响较大,少数民族由乡村到城镇,由“血缘”到“业缘”。新移民与当地入关注的社区治理是一样的,都希望社区治安、社区环境和社区服务有所增长<sup>[34]</sup>。怒江州地区的移民搬迁前居住分散,社区管理困难。搬迁后,移民集中安置,社区管理得到加强。外来人口的障碍来自于“流动人口的主观性抗拒”<sup>[35]</sup>。模型1表明社区管理增强程度影响移民家庭收入,后扶时期,需要重视移民社区安置点的管理,提升移民归属感和幸福感,加强政策宣传,提升移民家庭收入。

(3) 以往的研究多重视搬迁后移民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的分析,易忽略社会资本对生计的影响。本文关注社会资本对少数民族移民家庭收入的贡献。人情往来指标对于农户非农化转变具有重要的正向作用,农业和非农为主的移民家庭生计恢复策略有显著差异<sup>[36]</sup>。社会资本核心指标人情往来次数对移民家庭收入贡献大幅度超过其它资本,尤其是生计策略为生计多样类型的移民家庭,社会资本对其家庭收入贡献明显。深贫的少数民族地区的搬迁后,移民家庭的生计策略是由农业转非农业的过程,社会资本在生计恢复、转型和收入增加有着关键的作用。

(4) 家庭规模对农户收入有显著的负向作用,家庭人口越多、负担比越高,其人口生产性越低,可转化生计资本的产出越少,越不利于增收<sup>[16]</sup>。家庭人口数对移民家庭总收入有负贡献,由于怒江州是少数民族地区,不受早期计划生育政策的限制,家庭人口数远超其家庭合理人口数,家庭负担比较高,移民家庭增收越困难。后扶时期,需通过引导其优生优育的生育观念,减少因“人”致贫或返贫。另外,就业与就业培

训是搬迁后需要重视的,尤其是生产生活实用的技术<sup>[37]</sup>。非农劳动力对移民家庭收入贡献明显,搬迁后非农就业是主要提升家庭收入的核心,需加大移民非农就业的技能培训,引导移民进行非农就业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

(5) 物质资本是提高非农经营家庭收入的关键<sup>[14]</sup>,物质资本的自有资产显著影响着家庭的非农经营活动,自有资产越高的移民,其非农经营收入也显著较高<sup>[16]</sup>。家有资产是物质资本的核心,怒江州的移民家庭家有资产较低,为提升移民家庭收入,应增加实物援助为移民生计转型提供生产性工具,促进移民家庭收入的增加。

(6) 在生计资本对农户收入改善中,金融资本最强,人力资本次之,自然资本最弱<sup>[7]</sup>,而且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以及物质资本与农户家庭非农收入增长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sup>[14]</sup>。生计资本对移民家庭收入的贡献中,社会资本贡献最大、人力资本次之、物质资本第三、金融资本第四、自然资本最弱。搬迁后,移民家庭由农业生产生活转向非农业生产生活时,社会资本的需求增强,生计策略的转型增加了非农培训和就业的需求,物质资本中家有资产的改善推动非农经营创收,而金融资本是其它资本的生计后果。值得注意的是,金融资本的核心家庭存款对家庭收入贡献明显,家庭存款的增多,移民从事非农经营的可能性就会增加。同时,家庭存款是家庭面临生计冲击风险的直接保障,也是移民家庭进行投资创造再收入的根本。

(7) 不同生计策略对移民家庭收入影响各异,不同的生计资本对不同的生计策略家庭收入影响也不同。人力资本和耕地是影响移民家庭经济的重要因素<sup>[29]</sup>。本文中,家庭劳动力数量对务农为主务工为辅类型的家庭收入贡献明显,尤其是非农劳动力数量。搬迁后,如何由农业生产生活转向非农业生产生活是少数民族移民家庭收入增加的关键;社区风俗习惯差异、社区管理、子女受教育、家庭劳动力和家庭存款对务工为主务农为辅的家庭收入贡献明显。移民安置社区风俗习惯差异、社区管理、子女受教育情况是以务工为主的移民家庭“稳得住”的关键,同时家庭存款也是其进行外出务工的保障;人情往来和家庭存款对生计多样类型的移民家庭收入贡献明显,生计多样型的移民家庭多为自主营业、务工相结合的策略,需要“社会网络”进行资源链接和家庭存款进行再投资,进而促进家庭收入的增加。

## 5 结论

(1) 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反贫困效应明显。搬迁导致少数民族移民生计策略转变和生计冲击较大,呈现出以农业生产活动转向非农业生产活动。虽然,易地扶贫搬迁短时间导致不同生计策略的移民家庭收入减少,但易地扶贫搬迁推动了移民的生计策略结构的转变,大幅度减少了生计策略以农业为主的低收入家庭,改善低收入家庭增加收入效果明显。而且,易地扶贫搬迁使得整体的移民家庭人均年收入上升幅度 4.14%,增收效果明显。易地扶贫搬迁对移民生计资本的提升会随时间的增长而增长<sup>[38]</sup>,随着移民生计资本的提升,移民的家庭收入也将稳步增长。

(2) 东西帮扶、扶贫产业和就业技能培训政策效果明显。深贫的少数民族多生活在大山中,搬迁前移民基本从事农业生产生活。搬迁后,移民大多数从事非农业生产生活,家庭非农劳动力是其增收的关键。由于东西对口扶贫、扶贫产业帮扶、重视移民非农就业技能培训等因素,移民可选择扶贫车间就近务工或者选择向东输出的劳务务工。东西对口扶贫、扶贫产业帮扶、就业技能培训等就业政策在少数民族地区效果明显,推动了移民家庭生计策略转变和家庭收入增长。但是,少数民族地区早期不受计划生育限制,家庭人口数多,因“人”致贫和影响巩固脱贫的成果较大。后扶时期,针对不同的生计策略家庭,制定精准的策略帮扶,以促进移民家庭增收。

(3) 需重视原有土地资源的开发,进一步建设农村合作社。搬迁后仍有 23.1% 从事农业生产生活,这其中部分移民生计转型困难。农村合作社是生计策略以农业生产为主的移民家庭的生计兜底,土地仍是这部分移民生计的关键。怒江州需围绕自然资本进行培育,进一步盘活原土地资源,加大建设农村合作社力度,重视土地资源作为移民生计过渡和补充,保障以农业生产为主移民家庭的收入。同时,采取土地流转和入股、加强移民和原居住地的通勤等手段吸纳务农能手参与农村合作社的建设和生产,进一步增加搬迁移民的家庭收入。

(4) 移民家庭收入的贡献。返回居住地时间与农户收入水平呈负相关;社区风俗习惯差异与收入水平呈负相关;社区管理程度与移民家庭收入水平呈正相关;家庭人口数与移民家庭收入呈负相关、非农劳动力人口数和儿女受教育满意度与农户收入呈正相关;人情往来次数与移民家庭收入呈正相关且对移民



家庭收入的贡献最大; 家有资产与移民家庭收入呈正相关; 家庭劳动力人口与家庭收入呈正相关; 家庭存款与移民家庭收入呈正相关; 地理位置不影响移民家庭收入。

通过以上结论, 得到以下启示: 1) 特色产业帮扶、东西对口帮扶的就业政策效果明显, 少数民族移民的生计策略转变明显, 家庭收入增长明显, 需继续落实产业帮扶为移民提供就业保障。同时, 后扶时期, 深度贫困的少数民族地区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的生计可持续需重视各类生计资本的组合, 尤其是重视家有资产和人力资本的培育, 增加移民生计转型的推动力。2) 需重视加强少数民族移民搬迁后的社区管理和减少生产生活的差异。宣扬“优生优育”的生育观, 减少家庭人口负担, 重视少数民族移民儿女教育工作, 减少代际贫困传递。3) 需重视少数民族移民家庭内生动力的培育, 增加家有农业和非农业生产性工具的援助。增加非农技能培训和非农劳动力就业, 提供更多的借贷款策略, 增加少数民族移民从事非农经营的机会, 从而增加移民家庭收入和促进生计可持续。4) 搬迁后社会网络是少数民族移民家庭收入增加重要的影响因素, 农业就业转向非农就业过程中需重视移民社会网络的重建, 非农经营和非农就业转变需要考虑“关系”的构建。另外, 需重点重视搬迁后移民社区管理、少数民族文化保留和开发和非农业生产生活技能的培训。

### 参考文献

- [1] 蔡禾, 王进. “农民工”永久迁移意愿研究[J]. 社会学研究, 2007(6): 86-113.
- [2] 辛丽平. 贵州民族地区扶贫移民中的社会适应研究[J]. 贵州民族研究, 2019, 40(3): 55-59.
- [3] 徐锡广, 申鹏. 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的可持续性生计研究——基于贵州省的调查分析[J]. 贵州财经大学学报, 2018(1): 103-105.
- [4] ROBERTS M G, 杨国安. 可持续发展研究方法国际进展——脆弱性分析方法与可持续生计方法比较[J]. 地理科学进展, 2003, 22(1): 11-21.
- [5] 李树茁, 徐洁, 左冬梅, 等. 农村老年人的生计、福祉与家庭支持政策——一个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J]. 当代经济科学, 2017, 39(4): 1-10; 124.
- [6] 孙海兵. 南水北调库区移民可持续生计研究[J]. 水利发展研究, 2015, 15(5): 6-9.
- [7] 黄志刚, 陈晓楠, 李健瑜. 生态移民政策对农户收入影响机理研究——基于形成型指标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J]. 资源科学, 2018, 40(2): 440-450.
- [8] 管睿, 王文略, 余劲. 可持续生计框架下内生动力对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J].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19(6): 131-136.
- [9] 伍艳. 贫困山区农户生计资本对生计策略的影响研究——基于四川省平武县和南江县的调查数据[J]. 农业经济问题, 2016, 37(3): 88-112.
- [10] 赵雪雁, 李巍, 杨培涛, 等. 生计资本对甘南高原农牧民生计活动的影响[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1, 21(4): 111-118.
- [11] 苏芳, 蒲欣冬, 徐中民, 等. 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关系研究——以张掖市甘州区为例[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09, 19(6): 119-125.
- [12] 董晓霞, 黄季, ROZELL S, 等. 地理区位、交通基础设施与种植业结构调整研究[J]. 管理世界, 2006(9): 59-79.
- [13] 杜鹰, 韩俊, 黄延信, 等. 21世纪初期我国农村就业及剩余劳动力利用问题研究[J]. 中国农村经济, 2000(5): 4-16.
- [14] 刘林, 徐天骄. 生计资本与农户收入: 来自新疆深度贫困地区的经验证据[J]. 石河子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 34(1): 25-31.
- [15] 严登才. 搬迁前后水库移民生计资本的实证对比分析[J]. 现代经济探讨, 2011(6): 59-63.
- [16] 李聪, 王磊, 李明来. 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易地搬迁、家庭贫困与收入分异[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20, 30(7): 141-149.
- [17] 刘精慧, 薛东前. 陕北黄陵县农户生计资本评价及其生计策略研究[J].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19, 40(6): 157-162.
- [18] 李聪, 刘若鸿, 许晏君. 易地扶贫搬迁、生计资本与农户收入不平等——来自陕南的证据[J]. 农业技术经济, 2019(7): 52-67.
- [19] 赵剑治, 陆铭. 关系对农村收入差距的贡献及其地区差异——一项基于回归的分解分析[J]. 经济学(季刊), 2009, 9(1): 363-390.
- [20] 程名望, 史清华, JIN Y H, 等. 农户收入差距及其根源: 模型与实证[J]. 管理世界, 2015(7): 17-28.
- [21] 刘传江, 程建林. 第二代农民工市民化: 现状分析与进程测度[J]. 人口研究, 2008, 32(5): 48-57.
- [22] 李培林. 流动民工的社会网络和社会地位[J]. 社会学研究, 1996(4): 42-52.
- [23] 王春光. 农村流动人口的“半城市化”问题研究[J]. 社会学研究, 2006(5): 107-122.
- [24] 朱红根, 康兰媛, 翁贞林, 等. 劳动力输出大省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基于江西省1145个返乡农民工的调查数据[J]. 中国农村观察, 2010(5): 38-47.
- [25] 郝朝艳, 平新乔, 张海洋, 等. 农户的创业选择及其影响因素——来自“农村金融调查”的证据[J]. 中国农村经济, 2012(4): 57-65.
- [26] 马光荣, 杨恩艳. 社会网络、非正规金融与创业[J]. 经济研究, 2014, 46(3): 83-94.
- [27] 孙海兵. 水库移民生计问题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 19-27.
- [28] 万广华. 不平等的度量与分解[J]. 经济学(季刊), 2008, 8(1): 347-368.
- [29] 石智雷. 移民、贫困与发展——中国水库移民贫困问题研究[M].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8: 105-121.
- [30] 迈克尔·M. 塞尼. 移民重建与发展——世界银行移民政策与经验的研究二[M]. 南京: 河海大学出版社, 1998: 131-133.
- [31] 文军. 从生存理性到社会理性: 当代中国农民外出就业动因的社会学分析[J]. 社会学研究, 2001(6): 19-30.

- [32] 杨农. 数字陷阱与科学决策[J]. 中国金融 2014( 11) : 28 – 30.
- [33] 谢大伟. 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的可持续生计研究 – 来自新疆南疆深度贫困地区的证据[J].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20 34( 9) : 66 – 71.
- [34] 周大鸣. 城市新移民问题及其对策研究[M].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4: 354 – 355.
- [35] 王春光. 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和城乡融合关系研究[J]. 社会学研究 2001( 3) : 63 – 76.
- [36] 冯伟林 李聪. 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生计恢复策略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 – 基于陕西安康的农户调查[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 37( 2) : 73 – 81.
- [37] 施国庆 陈绍军 项和祖 等. 中国移民政策与实践[M].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01: 238.
- [38] 王君涵 李文 冷淦潇 仇焕广. 易地扶贫搬迁对坤平湖生计资本和生计策略的影响 – 基于8省16县的3期微观数据分析[J]. 中国人口 • 资源与环境 2020 30( 10) : 143 – 153.

## Livelihood strategy , livelihood capital and family income of immigrants involved in poverty alleviation relocation in deeply impoverished ethnic minority areas of Yunnan province

MA Ming<sup>1</sup> , CHEN Shaojun<sup>1</sup> , TAO Siji<sup>2</sup> , CAO Zhijie<sup>1</sup>

( 1.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 Hohai University , Nanjing 210098; 2. School of Philosophy and Political Law ,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 Kunming 650500 ,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country's 14th Five – Year Plan period , consolidating the result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relocation and enhancing endogenous development capabilities are the key points. Therefore , it is the key to understand the changes in livelihood strategies and household income increase caused by relocation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relocation. 515 household survey data in Nujiang Prefecture , Yunnan province were used to analyze the livelihood strategies and family income differences of migrants involving in poverty alleviation relocation. Based on the framework of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 a regression model of immigrant income was established to analyze the differences in the contribution of core livelihood capital and other factors to the income of immigrant families with different livelihood strategies.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poverty alleviation relocation has changed the livelihood strategies of immigrant families , greatly reducing low – income families whose main income is from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 and the higher the degree of non – agriculturalization , the more obvious the increase in family income. Poverty alleviation relocation has obvious anti – poverty effects in minority areas. The results of income regression show that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income of immigrant families with different livelihood strategies a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Differences in customs of resettlement communities , retention and development of ethnic minority culture , community management , and the number of family laborers significantly affect the income of immigrant families. The five cores of livelihood capital have different impacts and contributions to immigrant families. Among them ,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 household assets , non – agricultural labor force and family deposits make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s to the income of immigrant families. This article is of reference significance for investigating the effects of relevant anti – poverty policies in ethnic minority areas and strengthening precision livelihood support policies.

**Key words:** poverty – stricken ethnic regions; poverty – alleviation relocation; livelihood strategy; livelihood capital and household income